

《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基于副文本视角

本文主要围绕论文的主题《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针对与社会学视角下的副文本分析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首先从五个层面介绍国内外副文本与翻译研究的现状，然后再对文学译介与传播领域的社会学研究进行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的梳理，最后通过回顾《红楼梦》翻译研究的相关文献，对现有研究进行述评，发现其不足之处，从而提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

2.1 副文本与翻译研究

法国文学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 提出的副文本理论最早应用于文学领域，随后便迅速拓展到文本和副文本关系的研究(Kovala,1996:120)。副文本材料作为原文与目标读者之间的重要媒介，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拉近读者与文本的距离、使读者熟悉并且接受作品的内容(同上：140)。在西方英语翻译研究中，涉及热奈特副文本概念的文献最早出现于1996年国际期刊 *Target* 上面的两篇文章，分别出自于比利时学者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和芬兰学者乌尔波·考瓦拉(Urpo Kovala)。这两篇文章均认为翻译本身也具有其副文本内容，而不是将翻译看作是原文的副文本，并提出副文本是译者干预或使文本适应新环境的场所。他们反对热奈特将译文视为原作品透明复制品的保守观点，认为翻译作品中的副文本信息同样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此后与副文本相关的翻译研究逐渐开始进入学者们的研究领域(Bachelor, 2018:25)。近些年出现了三本专门针对该主题的专著，题目分别为 *Translation Peripheries: 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ranslation* (翻译外围：翻译中的副文本元素)，*Text, Extratext, Metatext and Paratext in Translation*(翻译中的文本、外文本、元文本和副文本)，*Translation and Paratexts* (翻译和副文本)此外，莫娜·贝克 (Mona Baker, 2006)，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 2007)，盖比·汤姆森·沃尔盖姆斯 (Gaby Thomson-Wohlgemuth, 2009)，莎朗·迪恩·科克斯 (Sharon Deane-Cox, 2014) 和萨米·汉娜 (Sameh Hanna, 2016) 等学者也将副文本研究纳入了其研究专著。国内副文本与翻译研究开始于2011年(殷燕，刘军平，2017：25)，相比于国外的研究时间较晚。副文本与翻译研究最初处于理论的引进和介绍阶段，后期逐渐出现应用性文章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至今还未出现相关主题的专著。

本文将国内外副文本与翻译研究的热点话题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1) 副文

本作为文献材料的历史性研究；(2) 副文本与译者声音研究；(3) 副文本与翻译出版策略研究；(4) 副文本与翻译作品形象塑造研究；(5) 副文本与翻译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研究。

2.1.1 副文本作为文献材料的历史性研究

为建立和巩固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副文本的作用在于利用译者序言和其他副文本材料将理论研究应用于构建历史传统。一些文学选集试图建立西方和亚洲这样的区域性传统，其他选集侧重于民族传统。例如，安妮·科恩特(Annie Cointre)和安妮·里瓦拉(Annie Rivara)(2006)搜集英语小说法语译本中的译者序言，目的主要是对十八到十九世纪早期法国社会出现的“英语热”现象进行探索。此外，副文本还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使他们能够重新构建特定作者的出版历史，或者对跨境文学作品的流向进行更为清晰的描绘。Anne Coldiron (2010)结合定量数据、语料库内容分析和副文本数据挑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中的中心批评叙事；Guyda Armstrong (2013)提出副文本的特征对重新构建特定作品的传播历史极为重要，特别针对那些历史记录不明确的作品。国内副文本与翻译研究在这方面相对欠缺，大部分的文献针对某一部文学作品的特定时期进行副文本分析，缺少历时性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2.1.2 副文本与译者声音研究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展示译文中译者隐身性时首次提到了译者声音的概念，他发现读者在阅读翻译作品时总是倾向于听到原作者的声音而忽略译者的声音，因此韦努蒂呼吁译者采用异化而非归化的翻译策略突显自己的可见性并且使其声音被读者听到(Venuti, 1995:238)。赫曼斯将译者的声音视为“第二种声音”，这种声音可能完全隐藏、无法被察觉，也有可能直接或是强有力的出现在译者前言、脚注和译者注释等副文本材料中。他认为副文本是译者对原作者或者文本表达在意识形态方面同情或者反对的地方，如同在译者和文本之间设置了一个重要的距离，使读者在这个框架中阅读文本(Hermans,1996:27)。

副文本与译者声音研究主要体现在分析译者的意识形态、翻译动机以及翻译策略等方面。西方学者们倾向于将翻译作品中的副文本材料独立于原作品，认为副文本是由于译者的干预使文本适应新环境的场所。在这个新的场所里，译者可以基于目标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例如罗伯托·瓦尔迪奥(Roberto A. Valdeon,2018)以西班牙小说《唐吉珂德》和《西印度毁灭述略》的

英语译本为例,将英译本中的标题、题献和译者序言的内容与目标语读者建立联系,对比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ips)和约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动机。菲利普斯的译文反映了译者反天主教的思想,他的身份立场也是基于反教皇、反西班牙的意识形态;相反,副文本信息显示史蒂文斯拥有专业译者的身份,他通过完整以及准确忠实于原文的翻译风格来取悦读者,使读者了解西班牙征服者的苦难。该文的副文本研究支持了前人对热奈特将翻译视为原文副文本观点的质疑,因为译作品副文本信息与目标读者所建立的联系很难与原文作者和原文读者的联系相比较。译者根据自身的翻译身份、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重新定位文学作品,使得翻译不仅仅是原文语言层面的转化。除了译者的意识形态以外,翻译文学中的译者序言还可以体现出译者的翻译动机,例如国内学者张季红(2016)以林译《浮生六记》的译者序言为例,探析林语堂的文化态度。根据林译《浮生六记》翻译副文本中的英文自序,可以发现林语堂先生融通中西的文化态度不仅体现于他能够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自信地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还表现在他擅长把握中外文化的共性,努力促进不同文化的取长补短、互相交融。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并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功利性目的或是纯粹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他的翻译动机更重要的是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智慧,并努力促成中西文化的融合。

分析译者所使用的翻译策略有利于目标读者更好的理解和接受文学作品,特别是针对我国含着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古代文学典籍作品,近年来该领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朱峰(2019)以金安平《论语》英译本为例,探索深度翻译中的译者角色和翻译策略的问题。通过对序言、附录和参考文献的分析,朱峰提出译者金安平的翻译动机是力图通过译文为西方读者还原真实的孔子,使译本具有一定的学术性特点。译者详细的注释内容和直译的翻译策略有助于读者重新构建原文产生的历史语境并且更为深入的理解源语文化。覃军(2019)基于《弟子规》十二种英译本的副文本对比分析,总结出四种副文本翻译策略分别为多种文本共用、漫画插图共赏、音频视频共享和讨论平台共建。这些策略可以促进正文传播信息,帮助读者更好的解读原文。

2.1.3 副文本与翻译出版机构策略研究

副文本的研究推动了对产生翻译作品的出版机构的探索,塔希尔·古拉格拉(Tahir-Gurçaglar, 2013:90)对第三人序言作者的研究表明,如果想要了解副文本如何在翻译作品中发挥作用,就要关注是谁为产生副文本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译者在副文本出版发表的决策中经常被边缘化，因此除了译者自身的声音以外，还应该关注出版机构对于译作品副文本的贡献。塔希尔(Tahir-Gurçağlar, 2013:92)从布尔迪厄(Bourdieu)的角度论述，认为序跋的作者通常“比译者具有更为权威的文学地位”，并且能够利用这种话语和象征性的力量提升译者的影响力，为其创造一定的文学资本。第三人序言(allographic preface)编写者并没有直接参与译文的出版工作，他们因享有较高的社会文化地位而被出版机构赋予相应的责任和特权来为译文编写序言。由此，她以1964年出版的托马斯·莫尔的《尤利西斯》第一部土耳其语译作品为例，解释第三人序言中意识形态重新语境化的现象(Tahir-Gurçağlar, 2013:95)。《尤利西斯》土耳其语译本的第三人序言作者米娜·乌根(Mina Urgan)是英语文学领域的知名教授，除了学术身份以外她还具有强烈的政治立场，并且是社会主义土耳其共产党的首批成员之一。在序言中，米娜以更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字结尾，列举了在“高级民主国家”可能成为现实的预言，这些预言包括性别平等、规定工作时长、免费教育、离婚不受限制以规范税收体系。此外，她还提及了原作者莫尔仍未实现的愿望，比如结束战争、实现公平分配收入和社会正义。

就翻译文学而言，在原语境和目标语境里作品的副文本呈现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出版机构就是产生这种变化最重要的媒介。通过文字、图像和布局，出版商的副文本信息标志着某一本书将包含在这一系列的书单中。同一书单上的标题往往以类似的出版策略进行营销，如果读者喜欢这类图书那么他们就会寻找类似的系列书籍，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市场营销方式(Cecilia Alvstad, 2012:90)。塞西莉亚·阿夫斯塔德(Cecilia Alvstad, 2012:94)以亚非拉关于生与死主题的诗歌和短篇小说选集为代表，展现了出版商在书名和前言部分使用的普遍性策略与带有异域风情的封面设计形成鲜明对比。在书名和前言中，出版商特意强调这部选集的主题具有普遍性，是人类所共有的特质，并声称人类是世界上唯一的种族。然而选集的封面设计却与之截然相反，封面图案中的八张人物照片里有染发的日本女孩、穿着红色比基尼的中国女孩、雨中奔跑的古巴男孩等，没有任何欧洲人的面孔。这种封面设计体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学说，是带有明显刻板印象的文化多样性。大卫·多姆罗施(David Damrosch, 2003:54)曾认为异国化元素属于普遍性的一部分，因为这些元素能够回应目标语文化的读者大众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期望。同样，孔子文(Szu-Wen Kung, 2013)发现美国出版社出版的台湾文学的封面设计也带有典型的异化甚至是东方主义色彩的特征，目的是为了激发读者

对于翻译作品的阅读兴趣。

此外,出版机构的市场化策略还体现于其领域中编辑的干涉行为。娜塔莉·马泽 (Nathalie Mälzer, 2013) 根据自己作为文学翻译家的经验,以非常醒目的术语勾勒出文本和副文本中编辑干预的程度。以盖埃尔·盖尔纳雷克·列维 (Gaëlle Guernalec-Levy) 的《L'Amant inachevé》为例,编辑采取了多种方式,使该书成为一本更偏向为色情的小说,用妓女裸露双腿的图像代替原著里中性的封面图片,甚至在文字本身中大量重写性爱场面。由此,马泽得出结论,如果想要更好的把图书推广入市场,翻译研究应该倾向于从对译者进行的文化适应性的重点转移到出版行业各个参与者的贡献。

2.1.4 副文本与翻译作品形象塑造研究

目标语读者所接触到的异国形象大多是通过阅读翻译作品来实现的,翻译是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必由之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副文本在翻译过程中也能发挥形象建构的作用(张晓芸,2011: 25)。西方人翻译中国古典小说时多在译本中添加前言和注释等副文本内容,其成为构筑“中国形象”的重要方式(宋丽娟、孙逊, 2009: 1999)。翻译副文本不仅参与建构异国和异域文化形象,也可以在译语文化中塑造和传播原作形象、原作人物形象、原作语言形象等。贺显斌(2017)通过分析《三国演义》两个英文译本的副文本信息,发现两位译者使用标题副文本的差异导致作品主题分别凸显了传奇性和历史性。此外,两个译本因出版社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封面、标题页和版权页等副文本信息显示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英语译本展示的是英语学习读物的形象;而在美国出版的译本首先展示的形象是汉语教学与研究文献,其次是亚洲文学作品。同样,当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走进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国内读者对其形象的认知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张勇(2019)考察了副文本视域下《少年维特之烦恼》郭沫若译本在我国的传播情况,该译本插图、封面和序言等副文本因素显示出“维特”形象在中国由郭沫若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到青春叛逆的斗士,再到自杀懦弱者的三级跳的传播变动,是对五四文学所走过的曲折路径的折射。“维特”形象的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已经完全超越了这一形象本身,而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2.1.5 副文本与翻译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研究

对于副文本的研究离不开翻译研究历程中出现的文化和社会转向,这种转向和许多翻译理论框架相关联,比如后殖民理论、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葛兰西霸

权主义理论、叙事学理论，这些都是学者在研究副文本翻译时所借鉴的理论。这一主题研究主要探索在副文本材料中出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与翻译和审查机构之间的动态关联。迪恩·科克斯(Deane-Cox, 2014)关注重译研究，结合副文本翻译分析了解重译现象是如何由所在的社会文化条件决定，以及他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侯平平(Hou Pingping, 2013)对《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的副文本进行考察，英文译本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宣传部进行组织翻译，其中的副文本材料在各个方面都增强了毛泽东主义的思想。这些副文本材料包括红色封面、以毛主席的名字和肖像为特征的书名页、包含具有意识形态上重要判断力的介绍性注释，以及警告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翻译的出版备注。

2.2 文学译介与传播的社会学研究

翻译是社会主体进行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的结果，并且与社会环境有关。翻译研究学者预见到社会学理论和概念的有用性，由此来探讨社会行为能动者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Wolf 2002: 34)。近年来，研究人员开始将社会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由译者以及其他社会行为能动者进行主导的一种社会现象。目前在翻译社会学理论中，布尔迪厄(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在文学译介与传播领域中应用的最为广泛，拉图尔(Latour)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近些年逐渐发展，卢曼(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运用较少。本文针对《红楼梦》在英语世界译介与传播研究，仅对翻译社会学中社会实践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研究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研究展开综述，以探索两种理论之间互为联系和互为补充的关系。

2.2.1 翻译社会学的理论发展研究综述

“社会翻译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与“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的概念最初由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奠基人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于 1972 年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中提出(Holmes, 1988)，然而在西方学术领域中，社会学与翻译学想结合的研究在二十年后才逐渐兴起。20 世纪 90 年代埃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在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该理论倡导将翻译现象纳入翻译作品生产的文化语境中，考察文学与语言、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之间的关系，使翻译研究模式不再局限于文本分析，把翻译这门学科从先前理论的局限性解放了出来”(Gentzler, 2001)。多元系统论将翻译研究直接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活动领域，并且促进了后来人们所说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Hermans,1999: 110)。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也日渐凸显。赫尔曼斯(Hermans, 1999)批评多元系统理论缺乏对参与研究现象中“个人”的考虑。此后出现了很多呼吁以参与者为导向的文献，翻译研究的重心逐渐从文本、翻译传统和话语翻译转移到对译者本身的研究（Hélène Buzelin, 2005: 203）。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被翻译学者用来作为避免去“个人”化研究的一种途径。丹妮·西蒙尼（Daniel Simeoni,1998）考察了由系统结构性质的研究转向翻译规范例如以译者研究为主要焦点的可能性。西蒙尼最早将布尔迪厄生产实践理论中的“惯习”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认为译者的惯习是在长期社会和文化历史中形成的带有个性化的结果，很难从实验收集的数据中获得。西蒙尼提出描写翻译研究之后的研究重点应更加关注翻译实践而不是文本和多元系统，应关注译者的惯习而不是翻译的规范（Simeoni,1998: 33）。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 1998）区分了信息或知识（information）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他指出“信息”是在专业层面发挥作用，而“文化资本”存在于人们所生活的社交圈。勒菲弗尔认为“文化资本”在文学翻译研究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不同读者对文化资本有不同需求，因此翻译参与者会根据不同的读者群体选择翻译的文本，并在翻译过程中体现文化资本（Lefevere, 1998）。伍尔芙（Michaela Wolf,2007）和萨皮罗（Gisèle Sapiro, 2008）随后重点研究“场域”对建构翻译社会学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对于之前学者争论的“翻译场域”的定义以及是否存在“翻译场域”的问题（如西米奥尼就认为所谓翻译场域只能算文学场域的一部分），伍尔芙指出，单纯依赖社会学的场域概念对于翻译这一涉及语言转换、文化碰撞的复杂社会行为不具备充分阐释力（Wolf, 2007 : 109）。她认为翻译之所以难以单独定位为一个场域是因为它跨越不同文化、不同场域，因此她建议引入霍米巴巴（Homi Bhabha）后殖民主义的“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概念，第三空间不属于任何一个场域，可以借此概念定位翻译（同上：113）。萨皮罗则重点关注翻译和出版领域，指出布迪厄的象征商品经济效益和场域理论对翻译社会学的贡献，将翻译置于某个特定场域，并分析其中的影响因素（Sapiro, 2008 : 154-166）。

海伦·布泽林（Hélène Buzelin, 2005: 195）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促使翻译研究者在布尔迪厄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考察译者和其他更多的参与者所在翻译过程性研究。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注参与者在场域中的地位及生平轨迹，而行动者网络理论更关注人和非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拉图尔认为要了解一个社会，首

先必须分析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即在物品是如何在社会传播中产生的(Latour, 2005)。从多元系统研究到布尔迪厄和拉图尔的理论框架研究,翻译社会学研究逐渐转向对参与者能动性的考察,布泽林(Buzelin, 2005)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可以互相补充。在方法论层面,相对于布尔迪厄的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更重视翻译过程研究,由此可以观察了解到各个翻译参与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信息获取、翻译决策以及如何与其他参与者进行协商合作,有利于最大程度的减少文学或者非文学翻译的二分法以及在学科内部产生的认识论上的分歧。在理论层面,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范式为检测与翻译性质有关的解释性假设提供了有利的数据来源,使研究重点由产品转向过程。布泽林认为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关注参与者在场域中的地位及生平轨迹,而行动者网络理论更关注人和非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Buzelin, 2005)。随后,布泽林(Buzelin, 2006)利用案例分析说明出版商在翻译活动和各个行动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研究中她采用了访谈、搜集材料以及参与者观察的方法,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角。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在翻译社会学理论发展方面以介绍引入西方理论为主。在方法论上,鉴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注重宏观语境描述、忽视微观文本分析的倾向,王岫庐(2019:14)将该理论的概念、方法与翻译研究的本体相结合,提出一种以文献学研究方法为基础,活态史料采集及分析为辅助,以翻译过程的行动者追踪及网络建构为导向的“行动者网络翻译研究”构想,展示其作为一种社会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可行性与解释力。

2.2.2 社会学在文学译介与传播中的应用研究综述

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在文学译介与传播中的应用研究主要围绕“译者惯习”、“资本”和“场域”这三个概念进行展开。国内翻译研究的学者主要针对译者惯习的微观层面进行研究分析。例如王洪涛(2018)以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英译《鲁迅小说全集》为例,考察译者在教育背景、学术研究和工作经历中所形成的译者惯习对其翻译选材、翻译观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从而阐释蓝诗玲的中国文学英译作品取得成功的原因(王洪涛, 2018)。国外的学者更侧重于宏观层面从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场域和资本的角度展开研究。萨米·汉娜(Sameh Hanna, 2016)探讨了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社会学对翻译研究的意义,尝试把翻译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认为这一事实只有在其社会文化环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作者通过考察莎士比亚四大悲剧阿拉伯语译本的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材料,利用布尔迪厄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了解莎士比亚四大悲

剧阿拉伯语译本在埃及的产生、传播和消费动态。该研究为翻译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埃及的文化历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白鸽 (Bai Ge, 2018) 以 20 世纪 30 年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洛丽塔》中文译本为例, 结合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探究副文本与翻译作品之间的关系。作者对不同时期的翻译副文本信息进行考察, 表明不同社会行为能动者和翻译生产过程中机构的参与有利于翻译作品更容易被目标语文化所接受。此外, 由于文化接受国在几十年间社会政治背景的变化, 《洛丽塔》在中国的翻译作品也体现出翻译活动与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协商, 对其翻译副文本的探讨可以了解翻译领域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近年来, 国内学者在典籍文化外译研究中也相继用到“场域”和“资本”的概念进行分析, 例如滕硕、王学博 (2019) 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场域和资本两个核心概念, 对《西游记》在德语区的译介传播进行描述性研究, 考察其德译本从片段德译、节译单行本到全译本的嬗变。研究发现特定时期的政治场域对译本的译介传播往往起着决定性影响, 同时译本的译介传播亦依赖于译者各种资本的积累, 卫礼贤片段式德译的畅销便是得益于其丰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最后, 翻译场域中各个参与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对于译本的传播也起着重要作用。林小发全译本的出版和传播过程便折射出翻译场域中主要参与者如译者、编辑、出版商以及媒体之间互动的重要性, 其中任何一方对译本的传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滕硕、王学博, 2019: 79-85)。滕雄、文军 (2017) 从翻译社会学场域理论视角看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的副文本。观察译本产生时所处的场域及其大环境, 分析出版社、译者、赞助商、读者等主体处于不同的位置, 掌握不同的资本, 拥有不同的惯习, 对译本副文本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而决定了副文本的呈现形式。

除了布尔迪厄的生产实践理论, 社会学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也逐渐被学者应用到文学译介与传播的研究。安娜·波吉 (Anna Bogic, 2010) 提出翻译社会学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在翻译产品的生产过程中, 译者并非是唯一的责任人, 幕后的编辑、出版机构等行动者 (actor) 也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出版商在翻译的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影响译者的翻译行为和最终翻译产品的质量。阿卜杜拉 (Kristiina Abdallah, 2012:2) 从普遍到特殊, 对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了分析。阿卜杜拉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翻译职场研究 (translation's workplace study) 中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它可以帮助学者以“过程”为关注点, 对翻译的整个生产网络进行研究, 并清晰地勾勒出行动者在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agency)、对过程的影响程度 (Kristiina Abdallah, 2012:4)。阿卜杜拉引入拉图尔的转化理论, 认为在

这个过程中译者需要通过某些策略扩大自己的网络。译者只有明确了自己在过程中的能力，并有意识地扩大自己的网络，才能占据更多的优势。骆雯雁（Luo Wenyan, 2018）把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于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英译作品中，旨在测试该理论在翻译生产研究中的适用性，通过对主要翻译人员（包括人类和非人类）以及整个文学翻译项目的形成进行广泛的讨论和分析，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系统性研究方法。作者从多种渠道搜集论证材料，其中包括翻译项目主要撰稿人之间 200 多封的邮件往来以及与《西游记》英译作品相关的副文本材料，例如译者编写的文章、出版商的传记、广告信息和从盖尔原始档案库（Gale Primary Sources）检索到的报刊书评等史料。该研究还原了 20 世纪 40 年代阿瑟·韦利《西游记》英译本在英国的生产以及在英语国家的传播过程。从微观层面、以动态、发展的视角分析翻译活动如何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翻译条件下产生并发展；对翻译行动者（包括出版商、译者、封面设计师等人类行动者以及战争、通信、网络翻译文本等非人类行动者），尤其是行动者的种类构成和身份形成（翻译网络中的能动作用、地位与角色）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翻译生产过程与翻译及翻译参与者的社会属性的形成是双向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

此外，还有学者将布尔迪厄的生产实践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对文学译介与传播展开研究。台湾文学的翻译工作在源语文化中进行了近三十年，其主要目的是在西方世界传播台湾文学，进而展示台湾的文化及其形象特征。孔子文（Kung Szu-Wen, 2010）以 1980 年之后美国文学领域中出现的台湾当代翻译文学作品的副文本材料为研究对象，结合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由此来考察台湾翻译文学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并且探索在翻译生产过程中社会的行为能动者在网络联系中的动态模式。通过对副文本的分析表明台湾文学的翻译作品在美国文学界主要呈现出两种译介与传播模式，即译者主导和行动者网络资助。该研究认为译者个人主导的译介与传播模式以及由来自于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不同社会行动者构成的译介与传播模式可以有效的将鲜为人知的台湾文学翻译并输出至美国文学主导的领域，特别是在文本的选择和出版方面。尽管行动者网络资助模式在翻译生产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然可以满足目标语文化的期待。汪宝荣（2016）运用场域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考察葛浩文译者惯习的形成及介入美国文学场域，分析有关行动者如何通过资本转化构建《红高粱》翻译发起、出版网络，促成葛译本在美国的顺利生产。研究反映了葛浩文《红高粱》翻译作品生产的行动者网络构建，译者看重《红高粱》的文学价值和商业价

值因而主动发起翻译网络,与此同时葛浩文凭借自身的社会资本招募到其他行动者,随后与维京企鹅出版公司洽谈获得了可观的版税。译者惯习决定了葛浩文的翻译方式是学术性与商业性兼顾,既有忠实严谨的一面,也有灵活变通的一面,其翻译风格也影响着翻译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效果。汪宝荣(2020)文运用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以西方商业出版社为考察中心,尝试构建一个用于分析中国文学在西方译介与传播过程的网络模式。提出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先后运作与项目发起、翻译生产(包括翻译、编辑、出版)、译作传播(包括评论推介、营销流通、学术或社会认可等)三个过程,而每个过程的完成都依赖一个特定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和运作,而这既要借助不同种类资本的转化,也牵涉行动者职业惯习的介入。各个行动者之间相互运作,形成了一种动态的网络关系,最终产生了文化产品,当行为者的个人惯习与行动者在场域占据的位置即资本相遇时,实践就发生了”(Wacquant 2006: 269)。

2.3 《红楼梦》的翻译研究

2.3.1 《红楼梦》英译史概况

《红楼梦》的英译史开始于19世纪,译者主要为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1812年,英国著名传教士、汉学家马礼逊(Morrison)翻译了《红楼梦》第四回,内容是贾雨村和门子关于英莲被拐一事的议论。译文准确流畅,附于写给伦敦传教会的一封信后面,但遗憾的是该书信并未发表。英国外交官、汉学家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中文名德庇时,是第二任香港总督,担任香港皇家亚洲学会的首任主席。1819年,德庇时翻译了《红楼梦》中对王熙凤和贾宝玉两位主角的简要描写,并刊登在《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上。1829年,他又尝试将中国诗词传播到西方,专著题目为《汉文诗解》(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其中包括《红楼梦》第三回《西江月》的两节诗词,德庇时把贾宝玉的形象译为“中国放荡不羁的公子哥”,此文于1830年发表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Royal Asiatic Translation)。1846年,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聘(Robert Thom)将《红楼梦》第六回的一些片段译为英语。译文登载于《正音撮要》(The Chinese Speaker)(又称《官话汇编》),这是一本帮助在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教科书,由宁波的基督教长老会出版社(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中文标注为“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珍藏”,标题为《红楼梦摘录》(Extracts from the Hung Low Mung)。1868年,时任清政府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鲍拉(Edward

Charles Bowra) 将《红楼梦》前八回译为英语, 译文从 1868 年至 1869 年连载于上海《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1884 年著名汉学家翟理斯在《古文选珍》(B. Quaritch) 中发表了一段描述太医到贾府诊病的简略译文。

随后, 英国外交官乔利节译了《红楼梦》前五十六章节的内容, 分为两卷于 1892-1893 年间分别由香港别发洋行(Kelly & Walshnd)和澳门商务排印局(Typographia Commercial)出版, 该版本是第一部以单行本形式发行的《红楼梦》英语译本, 之前几位译者对《红楼梦》的翻译均以报纸或者杂志期刊的方式发行, 未见单独成书。此外, 该版本也是第一部具有副文本信息的英语译本, 封面无人物图像, 标题为 HONG LOU MENG or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CHINESE NOVEL, 内附乔利译者本人的序言。时隔一百多年以后, 乔利节译版本屡经重印, 仅海外亚马逊官网销售的乔利《红楼梦》英译本, 就有多家出版商以不同副文本形式出版了六种纸质版本和四种电子版本。其中塔特尔出版公司(Tuttle Publishing)将两卷合为一卷, 重新装帧推出, 于 2010 年 9 月正式出版, 该版属塔特尔经典(Tuttle Classics)丛书之一, 是各版本中学术性较高的一种。新版乔利译本更换了旧版的封面, 增添了彩色人物图像, 并且书内除了译者序言还新添了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长达四千多字的前言介绍以及由爱德温·罗伊(Edwin Lowe)编写的新的内容简介。

1927 年, 王良志(Wang Liang—Chih)的《红楼梦》英译本在纽约出版, 书名为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明恩溥(Dr. Arthur Smith)为其撰写序言。该译本总共 95 回, 主要着眼于宝黛的爱情故事。但是此译本现已不存于中国国内馆藏目录及全美图书馆际互借目录, 此后所有译者在对前人译本进行回顾时都未提及该译本, 译本疑已佚失(江帆, 2014: 28)。1929 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王际真(Chi-chen Wang)对《红楼梦》进行翻译, 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伟利(Arthur Waley)为其作序, 由纽约的道布尔戴出版公司(Doubleday Doran Co.)和伦敦的劳特里奇公司(Routledge Ltd.)同时出版, 书名为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该译本共有三十九章, 分三卷出版, 前两卷包括原书前五十七回的内容, 第三卷为第五十八回至一百二十回的节译内容。之后, 王际真在 1929 年译本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扩充, 于 1958 年出版了他名下的第二个译本, 书名仍为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由美国纽约的吐温出版社(Twayne Publishers)出版。经过近 30 年的增补和修订, 新译本中加入了大量的细节描写, 译本共有六十章。美国著名诗人和评论家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为其作序, 以精装本和简装本两种形式

出版。1957年,《红楼梦》的另一个英译本,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由纽约的潘蒂昂公司(Pantheon Books Inc.)出版, 伦敦的劳特里奇及克甘公司(Routledge & Kegan Paul)则于1958年出版这一译本, 译者为美国的麦克休姐妹, 该译本是德文译本转译本, 转译自德国著名汉学家库恩的译本。

20世纪中后期,《红楼梦》开始进入全译时代, 世界上第一个一百二十回英文全译本出自邦斯尔神父, 约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 目前以打字机打印全稿的形式保存于香港大学图书馆内, 暂未出版成书。1973年, 日本著名翻译家佐藤亮一曾收到林语堂耗时十余年完成的《红楼梦》英译原稿及其修改稿。这部珍贵的原稿包括林语堂的解说、序章以及作为主体的六十四章和终章, 是对《红楼梦》全本一百二十回的编译, 也是《红楼梦》佐藤亮一日译本的原稿。林氏译稿是用打字机单面打印, 共859页。书名为 *The Red Chamber Dream*, 书名下印着“一部中国家族的小说”(A Novel of a Chinese Family), 并注明 by Tsao Shuechin(曹雪芹著)、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in Yutang (林语堂编译)。目前该译本保存于日本一家市立图书馆, 至今仍未出版也未对外公开(引自新华网)。

1973年至1986年, 英国汉学家、牛津大学中文教授霍克思和闵福德合作完整的翻译了《红楼梦》一百二十章回, 并由英国企鹅出版社(Penguin Group)进行出版发行。其中前八十回由霍克思单独翻译完成分三卷出版, 书名为《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 三卷的副标题分别为“黄金时代”(The Golden Days, 1973), “海棠社”(The Crab-Flower Club, 1977), “警示的声音”(The Warning Voice, 1980)。1982年至1986年, 闵福德翻译了后四十回, 在同一书名下分两卷出版, 副标题分别为“泪债”(The Debt of Tears, 1982)与“梦中人醒”(The Dreamer Wakes, 1956)。《红楼梦》的另一部英文全译本由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合作完成, 书名为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三卷, 第一、二卷1978年出版, 第三卷1980年出版, 译本包括《红楼梦》一百二十章回的全部内容。1999年, 外文出版社推出大中华文库系列, 更换1978年杨译本《红楼梦》的封面, 将译文分为六卷以汉英对照的形式重新出版。随后, 外文出版社再次推出中国经典名著系列(Chinese Classics), 将杨译本《红楼梦》分四卷出版, 更改每卷的封面设计, 添加封底内容简介, 同时图书内附由中国红学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石昌渝教授撰写的长达二十二页的引言介绍。

2018年12月译者应鸣(Eugene Ying)与其儿子兼任编辑以独立出版商的形式在美国出版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新的英文译本, 以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

式面向读者。译者在该版本中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翻译方法,同时翻译出版了其
他中国典籍文学作品包括《老残游记》(Journey of the Lamer)、《儒林外史》
(Scholarly Journal)、《水浒传》(Marsh Warrior Legend)、《西游记》(Journey to the
(Three Kingdom Epic), 均从属于翻译经典(translated classics)系列丛书。

2.3.2 副文本与《红楼梦》翻译研究

国内外对英译《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相对成熟,但研究对象多为译本中的正
文本,如英译本中的诗词翻译(王宏印,2002)、人名翻译(夏登山,2004)、
人物对话翻译(Liu,2008;夏登山,2014)、文化内涵的翻译(Wu,2008)、词语
翻译(刘泽权,刘超等2011;Lian,2014)、修辞翻译(冯全功,2012)、服饰文
化翻译(张慧琴、徐珺,2014)、基于语料库的语义显化翻译(侯羽,2017)等。
有少数学者对译本外翻译笔记(张婷,2013)、译本前言(党争胜,2013)、出
版信息(江帆,2014)、底本选择(李晶,2015)等某些译本边缘领域的副文本
因素有零散的研究,但都没有明确提出副文本这一概念。

中国知网数据库显示截至2020年4年,总共有12篇期刊论文、1篇硕士论
文明确提及《红楼梦》的副文本翻译研究,未见有博士学位论文在该领域进行研究。
国际期刊和专著里还未见对《红楼梦》副文本信息进行系统的研究,一方面因为
西方学者普遍对中国带有政治性读物的副文本材料更感兴趣,例如瓦莱丽·佩特
拉(Valerie Pellatt,2013)对赵紫阳回忆录的两个英文版本进行副文本分析;另
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国际刊物发表的文章大多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副文本翻
译为主,较少出现关于典籍文学副文本的研究。

(1)《红楼梦》英语副文本与翻译研究

李菁、王烟朦(2015)对霍译本的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进行详细的介绍。其
中内副文本中包括霍译本的封面、封底、出版信息、译者简介、注释和序言附录
等内容。外副文本主要包括译者笔记、译者为他人作序、公开演讲和书信等内容。
作者对这些副文本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历时性研究,在考察霍译本边缘领域的翻译
现象的同时,也从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两方面探讨了《红楼梦》霍译本取得成功
译介和传播的因素,帮助读者对霍译本的产生和创作获得全面客观的认识。杨柳
(2018)从社会学角度考察闵福德所译《石头记》后两卷的副文本,对《红楼梦》
主题意旨的发掘与探索,对原作成书及其传播之历史、政治及文化背景的梳理与
认识,对以原著的作者、续者和读者群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命情态的刻画,
以及对中国文化传统生命力和传承力的理解与阐发等,均有值得称道之处。作为

海外汉学家, 闵福德对中国文学及文化传统的认知与认同模式, 以及这种认知模式对其中国传统典籍翻译的影响, 均可从以上考察中获得充分的解读。朱薇、何中市(2018)对《红楼梦》第一个一百二十章回英文全译本—邦斯尔神父译本的学术性特征作出详细的分析, 该译本体例完备, 运用大量的副文本帮助读者理解。

金洁、徐珺(2020)选取 2010 年塔特尔出版公司发行的乔利《红楼梦》新版英文译本和 1892 年香港别发洋行发行的旧版英文译本所包含的副文本信息作为研究对象, 比较因时代的不断变化其副文本信息所承载文化内涵的异同, 并探究新旧不同版本的社会文化语境及所反映的时代特征。赵长江、郑多求(2020)对 2018 年应鸣《红楼梦》新版译本进行考察, 分析发现该译本的正文本以读者接受为中心, 副文本以介绍中国文化为中心。此外在翻译过程、译后编辑、翻译策略、目标读者和出版销售等方面与以往的译本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是新媒体时代下值得关注的翻译模式。

(2)《红楼梦》其他语种副文本与翻译研究

李雁(2014)从“深度翻译”视角分析了《红楼梦》法文全译本中部指代特定文化事物和观念的一类词或词组, 通过文本外的介绍、图表、注释等副文本材料, 展示法译本《红楼梦》深度翻译的具体方法, 对《红楼梦》在发过的文化传递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张逸琛(2019)进一步补充了法译全译本的内副文本研究, 认为封面和序言作为介绍性和铺垫性的内副文本, 为读者交代了正文的基本背景信息, 对读者起到了引导阅读进程、指引阅读方向的作用; 而注释和插图则更加深入广泛而全面地对正文本进行了辅助, 它们弥补正文本中的遗漏, 修正正文本中可能引起的误读, 阐释正文本中无法阐释的文化内涵, 保证正文本的文化信息得到最大限度的传递。

2.3.3《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往关于《红楼梦》在海外传播性研究大多运用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相关理论对正文的文本进行语言层面的研究, 或者对译者的主体性以及译者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 仅有少数的研究从出版机构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宏观背景下探讨《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本文仅对与《红楼梦》海外传播研究相关的文献以及从宏观层面考察《红楼梦》翻译过程和传播接受过程的文献进行回顾。

(1)《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姜其煌(2004)在其专著《欧美红学》中对《红楼梦》欧美译本的序跋进行全面的论述, 介绍英美红学、俄苏红学和德国红学的传播情况, 此外这本专著还

辑了九篇欧美红学家撰写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或者摘要。作者通过对大量相关材料的探索发现，欧美人研究《红楼梦》时在研究主题、内容和社会意义、与中国小说传统关系、艺术技巧、语言和书名等方面与我国的红学研究理论存在一定的差距，出现截然不同的“欧美红学”。作者在该专著中为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红学研究素材，同时也给红学研究者留下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红楼梦》在欧美文化界遇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在欧美知识分子群中，除少数汉学家以外，知道《红楼梦》的寥寥无几。江帆（2007）在博士论文中将《红楼梦》的英文翻译史分为三个阶段：1830年-1900年在华殖民圈的实用主义翻译，1901年-1960年英美本土的市场化翻译，1961年-至今《红楼梦》英译的学术性转向。作者介绍早期《红楼梦》的翻译目的是提供语言学习材料和消遣性读物，译文偏向于直译、忠实于原文。在第二阶段中，王际真译本和麦克休译本在英美图书市场中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化特征，目标读者主要是英美国家的普通读者。1960年以后，霍克思与闵福德全译本出现后，《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译”与“介”同时进入高度学术化阶段，受到了汉学家和专业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虽然企鹅出版将霍克思和闵福德的《红楼梦》全译本定位于是针对于不同阶层读者的经典文学作品，但是却没有得到如同第二阶段中出现的广泛的普通读者群。在第二部分的评介史部分，作者着重对西方学者关于《红楼梦》学术性的评价专著展开详尽的分析，其中包括那美愫使用西方传统小说批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文本分析的英文专著，“反讽”、“寓言”和“互文性”的西方批评概念，神话和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和叙事学研究，以及集中西方哲学、宗教和伦理概念的介入。此外还集中涌现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江帆（2007）博士论文内容丰富，资料详实，从“译”和“介”的视角系统的梳理了从19世纪初到2007年之前《红楼梦》的英译史以及其在英美国家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材料。崔艳秋（2014）在博士论文中提到进入90年代后，与80年代的政治关注和追踪报道中国文艺政策不同，美国主流报纸开始出现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大众化解读，例如1991年在美国《纽约时报》中介绍《红楼梦》、红学和中国饮食文化的相关信息。同时作者也指出由于文化隔膜的存在，西方读者不了解中国文化看不懂《红楼梦》，由此产生了很大的阅读障碍。

此外，还有学者考察权利关系对于《红楼梦》翻译过程及传播的影响。例如冉诗洋（2013）在博士论文中以《红楼梦》的杨译本和霍译本为个案，探讨文本选择中不平等权力关系对于译者确定翻译原则的影响以及采用相关翻译策略的

影响。翻译就是理解过程，所有的理解以及对理解的阐述始于对原文的信任，这种信任又同时受到政治语境、经济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也取决于译者和赞助人。杨译本和霍译本受到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制约，因此在文本选择、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方面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差异明显的译本。根据描述翻译研究方法，作者确定文本选择为翻译过程的第一个步骤，并且确定翻译过程中文本的选择、翻译原则的确定和翻译方法的使用基本上都受到了政治权力关系、经济权力关系和文化权利关系的影响，因此整个翻译过程都受到了权力关系的影响。

在国内的期刊文献中，学者主要就王际真英译本、麦克休姐妹英译本、杨译本和霍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做出相关的讨论。管兴忠（2016）总结了王际真《红楼梦》英译本的出版信息、序言内容和译者的翻译策略。简要对比了王际真译本和麦克休姐妹译本的区别，并通过纽约时报以及 Goodreads 和 Amazon 的读者评论对王译本给予肯定。唐均（2015）提到旅美华裔王良志 1927 年和王际真 1929 年、1958 年的《红楼梦》英文译本都是东方主义思维制约的典型产物。两位译者节译《红楼梦》，扩大了《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在中学西渐道路上的开拓性功绩毋庸置疑。但是唐均认为两位译者将《红楼梦》这样一部丰富的文学作品大肆删节，将《红楼梦》复杂、深邃的主题简化为浪漫的情欲之爱，在内容上突出宝黛情史淡化中国古典社会的净雅生活；同时为了方便西方人阅读，书中男子之名皆音译，女子之名皆意译。此时的《红楼梦》变成了一部西方化的流行小说，成了流于简单俗套的三角恋爱故事。汪庆华（2015）以杨宪益、霍克斯译著《红楼梦》为例，从传播学视域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与翻译策略选择的关系。指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以异化为主的观点忽视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读者文化接受能力和立场。他认为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的霍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好于使用异化翻译策略的杨译本，归化策略的英语译本，他认为霍克斯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避免了中国文化对广大英语普通读者可能造成的阅读障碍。王宁（2011: 3）也持相似的观点，提到杨译本大多放在高校图书馆，仅为一些东亚研究者和翻译研究者所查阅和参考；而霍译本则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大小书店，甚至在飞机场的畅销书店里也能见到。这两个被誉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重要里程碑”（王宏印 2004: 65）的深受我国学界推崇的译本在西方的传播范围和产生的影响却有很大的差别。霍译本不仅受到普通读者大众的喜好，而且还得到了一些专业型读者的偏爱。相比之下，杨译本在发行量、借阅量、读者评价等方面都不尽人意。

（2）《红楼梦》在其他语种国家传播与接受研究

吴昊（2018）通过《红楼梦》日译本观察近现代日本文化语境对红楼“现代性”的表象与特征，从中可窥见中国文学在日本的接受特征与近现代日本眼中的中国形象。日译编译本由于在改编上译者主体性发挥较大，是面对非专业群众的普及性大众文学，相比于全译本更能体现出日本接受的民族特点、时代风潮、审美意识。译者通过追踪编译的生成、流通、接受环节，以获得编译本对《红楼梦》现代性接受的嬗变路线图。作者还指出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对《红楼梦》的定评却逐渐趋向于认同“现代性”，与面对一般大众的编译本形成反差。编译本质上是日本社会的需求为主体、对原著有目的性的过滤与嫁接的产物。百年间作为“他者”的《红楼梦》在编译本中衍生出一系列中国的虚像，其本质是中国故事的现代性与现代日本文化架构之间的交锋与交融。谢依伦（2018）对《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进行研究，论文的研究范围从《红楼梦》被带入马来亚的可能性（1820年代）开始乃至2018年近两百年的时间。笔者通过文献记录，尝试展现《红楼梦》在某一时代如何传播，当时的传播主体是谁、传播了什么信息、其受众范围的大小，以及根据受众的反馈来探讨《红楼梦》传播的影响力。而后再对已出版的《红楼梦》相关文章与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为马来西亚新红学做一个概括性的基础介绍。此外，作者还提到进入了新媒体时代，随着《红楼梦》文本与视听文化产品不断出现，读者可以接触到各种版本、译本、研究论集、优秀课程视频、影视、戏曲、现代版舞台剧表演。然后如何去感悟、读懂《红楼梦》，仍需要有领路人。

2.4 现有研究的述评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国家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给予了典籍文化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的高度重视，使得海内外的红学研究蓬勃发展。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旧文献的相关数据和信息相对滞后，例如后期出现的邦斯尔教父英文全译本、在日本发现的林语堂英文全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再版、乔利英译本再版和应鸣新译本以及海外亚马逊官网推出的各种电子版译本虽在期刊论文中都有提及，却没有作为英译史的一部分，整体的出现于学位论文之中，进而对新时代背景下《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在《红楼梦》英译史研究的学者中，仅江帆（2007）在其博士论文以及专著中较为系统的介绍了《红楼梦》的译介过程和作品形象的变迁。文章谈到《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目标读者由在华殖民圈的英语居民扩展到英美国家的普通读者，

后又缩小到专业研究人员层面；发行机构也由国内的殖民机构，到英美市场再退居到狭小的学术发行圈。江帆的研究清晰地勾勒出百年英译史中《红楼梦》作品形象的变迁以及发行机构和受众群体的变化情况，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然而立足于当今的时代背景，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结合翻译产品的副文本信息、副文本产生的参与者以及源语和目标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考察《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传播研究，发现以往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以往文献中较少涉及文学作品的视觉文化研究。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在 20 世纪初首次提出“视觉文化”概念，后来芝加哥大学教授托马斯·米歇尔（W.J.Thomas Mitchell）将这种文化现象称为“图像转向”（Picture Turn）。在美国，视觉研究从艺术史系中生长独立出来；在英国和东南亚，视觉研究更多地与文化研究相近；而在欧洲大陆，视觉研究与符号学和传播学理论联结在一起。因而，从学科视野出发，视觉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来自于艺术史、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等三种途径（肖伟胜，2015）。西方学术界已出现相关的专著和文章将文学作品中的视觉因素和翻译相结合，例如马修、穆迪等（Matthews, N., and N. Moody, 2007）学者编著的《以封面见书》（Judging a Book by Its Cover）以及马克·索佐尼（Sonzogni, Marco, 2014）编写的《再版封面-将图书封面设计视为符号翻译的案例研究》（Re-Covered Rose, a case study in book cover design as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但是在我国，对《红楼梦》作品中的视觉文化研究仅限于美术学院，例如陈晓（2012）在博士论文中以清代《红楼梦》的图像世界为研究对象探讨图像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高雁（2017）的博士论文对《红楼梦》图文关系的审美嬗变进行研究，运用相关图文理论和文化学理论探析图文二者的互动互文状态以及图文关系的审美走向，突显图文互动中不断强化的图像主体能动作用，挖掘《红楼梦》图文关系的独特价值。至今为止《红楼梦》的图像研究还未真正走进文学和翻译领域。尽管少数翻译学者已经关注到封面对翻译文本的影响，但还未进行深入的研究，仍停留在阐释文本，较少关注其商业价值以及美学价值。

其二，对于西方大众读者的接受研究相对滞后。在《红楼梦》的西方读者接受研究中，学者普遍认为霍克思的译本语言流畅、接近于西方读者阅读习惯因而更为目标读者欢迎，王际真译本的影响力更为深远。然而近年来，西方读者对杨译本的关注与日俱增，他们赞叹译者杨宪益精湛的诗词翻译，书中的插图也增添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读者认为霍译本过于西化反而丢失了原有的中国文化特色，

杨译本才是最完整的反映出《红楼梦》原著的翻译作品。此外，到了新媒体时代，《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不再局限于纸质版的图书，海外市场出现了大量的电子版本，《红楼梦》英文歌剧以及红楼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仅吸引了英美国家的读者，更是得到了世界各地汉语爱好者的关注。因此，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与时俱进产生新的研究以记录红学在海外的发展历程。

其三，研究维度相对单一。在国外的翻译研究领域，学者们关注副文本的文化内涵、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商业价值等多个维度的研究。他们倾向于将翻译作品中的副文本材料独立于原作品，认为副文本是由于译者或出版机构的干预使文本适应新环境的场所，在这个新的场所里，译者可以基于目标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西方英语世界出版机构在选择翻译作品时，也会出于其意识形态或者图书市场化的需要，通过更改封面和排版设计的方式来迎合西方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例如将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图案作为某些亚洲文学译作品的封面，满足西方读者对东方世界异国情调的好奇心。出版商还会邀请权威人士为即将出版的译作品作序言，第三人序言相对于译者序言更利于提高作品的文学资本，是图书市场重要的营销策略。

相比之下，我国的翻译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典籍文学外译的研究中更侧重于强调副文本对于文化内涵的阐释。学者们倾向于把译者序言、译者注释和附录等副文本信息看成是原文的辅助性材料，在副文本中考察译者的主观性和翻译策略。其作用在于阐释和补充说明原文的内容，是深度翻译的重要体现，可以用来解释文本中出现的文化元素，并且认为这些副文本素材能够帮助读者重新构建原文的历史文化语境。然而在文学作品的外译过程中，其参与者不仅仅包括译者，出版商和编辑也是重要的行为主体，他们共同协作决定着副文本的制作和产生。由此可见，从多个维度对翻译作品进行阐释和宣传，加强出版机构的策略研究也是国内译介与传播研究领域值得关注的方向。

最后，缺少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宏观历时性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大多采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或者二者相结合考察文学译介与传播的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已经出现学位论文、专著和期刊等形式将翻译社会学理论包括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较为成熟的应用于具体的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并且倾向于将与翻译作品相关的副文本材料作为研究对象的一手材料，探索翻译生产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互动关系，例如已经有学者运用翻译社会学理论分析《西游记》、《洛丽塔》和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等经典名著。相比之下，国内

对于文学译介与传播的社会学研究仍处于理论的介绍阶段,仅少数学者将其应用于文学翻译作品之中,其目的主要在于讨论终端翻译产品的译文翻译质量和翻译效果,较少关注副文本对翻译文学的传播作用。此外,以往的文献中没有把《红楼梦》的翻译工作看作是社会活动的结果,也未出现相关的学位论文和专著从副文本视角出发,结合翻译社会学理论考察《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副文本材料作为翻译文学的媒介,对其在传播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考察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的研究侧重于对翻译作品的副文本材料进行微观层面的共时性研究,较少提及在翻译过程中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与副文本之间的动态关系。实际上,当一部作品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其目标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环境都会影响副文本对于翻译作品的形象塑造。重译和再出版现象也正是说明了当过去的译作品无法满足当下读者的阅读期待时,新的译作品就会应运而生,副文本材料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读者群。对于国内的学者而言,结合翻译社会学理论,加强副文本翻译的宏观历时性研究,可以更为全面而客观的考察翻译作品在目标语文化中的传播与读者接受情况。副文本的出现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为以结果为导向和以语境为导向的研究提供了独到的见解,也促进了对翻译史和翻译出版机构的研究。与此同时,运用翻译社会学理论可以解释文学译介与传播的过程性和历时性研究,还原翻译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因此,本文基于副文本视角考察《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以便更好地将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传播至西方世界,我国的文学作品所面向的读者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汉学家和专业人员的研究领域,而是使更为广泛的西方读者群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 [1] 查明建. 多元系统理论的整合与翻译文学史研究的拓展[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2(2): 126-139.
- [2] 党争胜. 霍克思与杨宪益的翻译思想刍议[J]. 外语教学, 2013(6): 99-103.
- [3] 管兴忠. 王际真英译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J]. 外语教学, 2016(3): 104-108.
- [4] 侯羽. 《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的名词化与隐/显化关系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7(6): 123-133.
- [5] 金洁, 徐珺. 副文本视角下乔利《红楼梦》新旧英译本探析[J]. 红楼梦学刊, 2020(1): 322-335.
- [6] 金洁, 徐珺. 《红楼梦》在英国: 19 世纪至 21 世纪英国报纸中的《红楼梦》[J]. 红楼梦学刊, 2021(2).
- [7] 江帆. 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7.
- [8] 江帆. 文学外译的助力/阻力: 外文社《红楼梦》英译本编辑行为反思[J]. 中国比较文学, 2014(1): 50-65.
- [9] 李晶(译), 闵福德(著). 乔利英译《红楼梦》再版前言[J].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2014(10).
- [10] 李晶. 道阻且长, 溯洄从之一杨译《红楼梦》底本问题中的译者主体性述评[J]. 红楼梦学刊, 2015年(2): 238-264.
- [11] 李菁, 王烟朦. 《红楼梦》英译本研究的副文本视野—以霍译本为例[J]. 东方翻译, 2015(04):50-56.
- [12] 李丽. 英语世界的《红楼梦》研究—以成长、大观园、女性话题为例[D].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
- [13] 李伟超. 副文本视野下《米拉日巴道歌》英译研究—以张澄基译本为例[J]. 西藏研究, 2019 (04): 132-138.
- [14] 李雁. 《红楼梦》法译本的“深度翻译”及其文化传递[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 46(4): 616-624.
- [15] 刘翔, 朱源. 伊维德说唱文学英译副文本的民俗叙事建构[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9 (6): 99-108.

- [16] 刘泽权, 刘超朋等.《红楼梦》四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初探—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J]. 中国翻译, 2011(1): 60-64.
- [17] 骆雯雁.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翻译生产描述研究中的应用—以亚瑟·伟利英译《西游记》为例[J]. 外语研究, 2020(2): 84-90.
- [18] 冉诗洋. 翻译过程中的权力关系[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3.
- [19] 宋丽娟, 孙逊. “中学西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1735-1911)[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6):185- 200.
- [20] 王宏印. 《红楼梦》回目辞趣两种英译的比较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1): 54-57.
- [21] 汪庆华. 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与翻译策略选择—以《红楼梦》英译为例[J]. 外语教学, 2015,36(03): 100-104.
- [22] 王烟朦. 副文本视角下霍译《红楼梦》的译者主体性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 [23] 吴昊. 现代性的因缘[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 [24] 夏登山. 《红楼梦》姓名翻译与注释译法[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 119-123.
- [25] 夏登山, 丁怡萌. 《红楼梦》中的多方会话及其艺术功能[J]. 明清小说研究, 2012(2): 112-119.
- [26] 肖伟胜. 观看的方法—如何解读视觉材料[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
- [27] 谢依伦. 《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8.
- [28] 邢杰, 陈颢琛, 程曦. 翻译社会学研究二十年: 溯源与展望[J]. 中国翻译, 2016,37(4): 14-20.
- [29] 邢杰, 黎壹平, 张其帆. 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翻译研究的效用[J]. 中国翻译, 2019,40(5): 28-36.
- [30] 杨柳. 从英译本副文本看《红楼梦》本土性显现的历史特征[J]. 曹雪芹研究, 2019(2): 122-132.
- [31] 杨柳. 文化摆渡者的中国认同—闵福德《石头记》后两卷译本的副文本研究[J]. 曹雪芹研究, 2018(4):127-138.

- [32] 殷丽. 中国经典丛书的出版思考—以《大中华文库》和《企鹅经典系列》丛书为例[J]. 出版广角, 2017(16):55-57.
- [33] 殷燕, 刘军平. 国内副文本研究三十年(1986—2016)——基于CiteSpace的科学计量分析[J]. 上海翻译, 2017(4): 22-26.
- [34] 张季红. 浅析林语堂的文化态度与跨文化传播实践—以林译《浮生六记》的翻译为例[J]. 上海翻译, 2016 (1): 71-75.
- [35] 张慧琴, 徐珺. 《红楼梦》服饰文化英译策略探索[J]. 中国翻译, 2014,35(2): 111-115.
- [36] 张晓芸. 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在路上》汉译为个案[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37] 张逸琛. 论《红楼梦》法译全译本内副文本的作用[J]. 曹雪芹研究, 2019(4):83-97.
- [38] 张勇. 郭沫若所译“维特”形象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J]. 中国翻译, 2019,40(3): 75-85.
- [39] 张晓红, 刘金龙. 典籍英译对外出版的读者定位—以《三国演义》的英译为例[J]. 中国出版, 2015(7): 29-32.
- [40] 赵长江, 郑中求. 应鸣《红楼梦》英译本概貌于简析[J]. 红楼梦学刊, 2020(1): 280-300.
- [41] 仲伟合, 冯曼. 翻译社会学视角下文化外译研究体系的建构[J]. 外语研究, 2014(2): 57-62.
- [42] 朱峰. 深度翻译中的译者角色与翻译策略—以金安平《论语》英译本为例[J]. 中国文化研究, 2019(04): 149-159.
- [43] 朱明胜. 《西游记》英译本副文本解读[J]. 小说评论, 2016(4): 100-107.
- [44] 朱晓烽. 《苗族史诗》英译的语境重构—基于副文本的解读[J]. 外语电化教学, 2019 (4): 19-24.
- [45] 朱薇, 何中市. 《红楼梦》邦斯尔译本的学术性特征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38(2): 177-180.
- [46] 朱志瑜. 林译副文本研究:爱国还是爱文学?[J]. 中国翻译, 2016, 37(4): 29-34.

- [47] Abdallah, K. Translators in Production Networks. Reflections on Agency, Quality and Ethic[D].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Theology*. Joensuu: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2012.
- [48] Alvstad, C. Publishing Strategies of Translated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Argentina: A Combined Approach[J].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2003, 48(1): 266-275.
- [49] Alvstad, C. "The Strategic Moves of Paratexts: World Literature through Swedish Eyes". *Translation Studies*, 2012, 5 (1): 78–94.
- [50] Alvstad, C. Voices in translation[A].// In Y. Gambier & L. van Doorslaer ed.,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3(4): 207-210.
- [51] Appiah, K. A. Thick Translation. In L.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52] Bachelor, K. *Translation and Paratexts*[M].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18.
- [53] Bai, G. From a "pornographic" book to a classic: Paratexts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Lolita[J]. *Babel*, 2018, 64(5): 671-691.
- [54] Bai, G. *The Paratexts of Erotic Translation: Lady Chatterley's Lover and Lolita in China*[D]. Durham University, 2018.
- [55] Baker, M.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1st ed.)*[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56] Bassnett, S. The Meek or the Mighty: 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A]. //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10-24.
- [57] Bassnett, S. Moving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Transfer[J]. *Trasvases culturales: Literatura, cine, traducción*, 1997(2): 7-20.
- [58] 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3rd ed.)[M]. London: Routledge, 2002.
- [59] Bourdieu, P.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Sociological Theory*[M]. 1989, 7(1): 14-25.
- [60] Bourdieu, P.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C].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61] 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0.
- [62] Bourdieu, P.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 [63] Bourdieu, P. & Wacquant, L J D. *An Invitation of Reflexive Soci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2.
- [64] Buzelin, H. Unexpected Allies: How Latour's network theory could complement Bourdieusian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J]. *The Translator*, 2005, 11(2) : 193-218.
- [65] Damrosch, 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66] Dean-Cox, S. *Retranslatio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Reinterpretation*[M]. London: Bloomsbury, 2014.
- [67] Dimitriu, R. Translators' Prefaces as Documentary Sources for Translation Studies[J]. *Perspectives*, 2009, 17(3): 193-206.
- [68] Even-Zohar, I.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J]. *Poetics Today*, 1990(1) : 45-51.
- [69]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 Translated by Jane 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70] 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1.
- [71] Gerber, L. Marking the Text: Paratextual Features in German Translations of Australian Children's Fiction[A].//In Anna Gil Bardají, Orero Pilar and Sara Rovira Esteva ed., *Translation Peripheries: 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ranslation*[C]. Bern: Peter Lang, 2012: 43–61.
- [72] Hsia, C. T. Love and Compass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J], *Criticism*, 1963, 5(3):261-271.
- [73] Hsia, C. T.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ts Reception Today as a Produ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A].//In C.T. Hsia,ed, *Chinese Literature*[C]. New York: Columbia Press. 2004.
- [74] Hanna, S. *Bourdieu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Socio-cultural Dynamics of Shakespeare Translation in Egypt*[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75] Haroon, H. The Translator's Preface as a Paratextual Device in Malay-English Literary Translation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Researching*, 2017, 9(2).
- [76] Hermans, T. The Translator's Voice in Translated Narrative[J]. *Target*, 1996,8(1): 23-48.
- [77] Hou, P. Paratext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A]. In Valerie Pellatt ed., *Text, Extratext, Metatext and Paratext in Translation*[M].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33-47.
- [78] Jiang, M. Y. Female voices in translation: an interrogation of a dynamic translation decad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1980-1991[J]. *The Translator*, 2019, 25(1):1-12.
- [79] Kovala, U. Translation, Paratextual Mediation, and Ideological Closure[J]. *Target*, 1996, 8(1): 119-147.
- [80] Kung, S. W. Paratext, an Alternative in Boundary Crossing: A Complementary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Analysis[A].//In Pellatt, V. ed., *Text, Extratext, Metatext and Paratext in Translation*[C].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49-68.
- [81] Latour, B. On Actor-network Theory: A few clarifications[J]. *Soziale Welt*, 1996(4): 369-381.
- [82]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network 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83] Lee, S. B. Translators, Translations, and Paratexts in South Korea's Gender Conflicts [J]. *Perspectives*, 2020, (1): 1-16.
- [84] Lee, Z. Y. The "Second" Bride: The Retranslation of Romance Novels[J]. *Babel*, 2018, 64(2):186-204.
- [85] Lian, Z. J. A Parallel Corpus-Based Study of Emotion Words in Hong Lou Meng and Their Translation[J].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2014(1):64-71.
- [86] Liu, Z. Q. Translating Tenor: With Reference to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 Lou Meng[J].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2008(3): 528-548.

- [87] Luo, W. Y. A Literary Translation as a Translation Project: A Case Study of Arthur Waley's Translation of Journey to the West[D]. Durham University, 2019.
- [88] Luo, W. Y. & Zheng, B. H. Visiting Elements Thought to be “Inactive”: Non-human Actors in Arthur Waley’s Translation of Journey to the West[J].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17 (4): 253-265.
- [89] Mälzer, N. Head or Legs? Shifts in Texts and Paratexts brought about by Agents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A]. //In Jansen, H. & Wegener, A. ed., *Authorial and Editorial Voices in Translational*[M]. Quebec: Editions québécoises de l’oeuvre, 2013: 153–76.
- [90]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4 edition)*[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91] Pellatt, V.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aratext and paratext of Chinese Translation[A]. // In Shei, C. & Gao, Z,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Translation* [C]. Abingdon: Routledge, 2017.
- [92] Pellatt , V. Packaging the Product: A Case Study of Verbal and Non-verbal Paratext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J]. *The 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2013(20): 86-105.
- [93] Sapiro, G. Translation and the Field of Publishing[J]. *Translation Studies*, 2008(2): 154-166.
- [94] Sonzogni, M. *Re-Covered Rose, A Case Study in Book Cover Design as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 [95] Tahir-Gürçağlar, S. Agency in Allographic Prefaces to Translated Works: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Turkish Context[A].//In Jansen, H. & Wegener, A. ed., *Authorial and Editorial Voices in Translation*[C]. Quebec: Editions québécoises de l’oeuvre, 2013: 89-108.
- [96] Tahir-Gürçağlar, S. Paratexts[A].//In Gambier, Y. & Doorslaer, L. ed.,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Volume 2*[C]. John Benjamins, 2011:113-116.
- [97] Tahir-Gürçağlar, S. What Texts Don’t Tell: The Use of Paratext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A]. //In Hermans, T. ed.,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M]. Manchester: St, 2002: 44–60.

[98] Wolf, M. Fukari, A.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7.

[99] Wu, W. J. Translating Culture: A Linguistic Reading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J].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2008(3):507-527.